

#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79年8月10日 星期五  
农历己未年闰六月十八 第11354号

##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同志 会见并宴请黄文欢同志

对黄文欢同志安全来到中国表示很高兴。黄文欢同志和  
华国锋同志强调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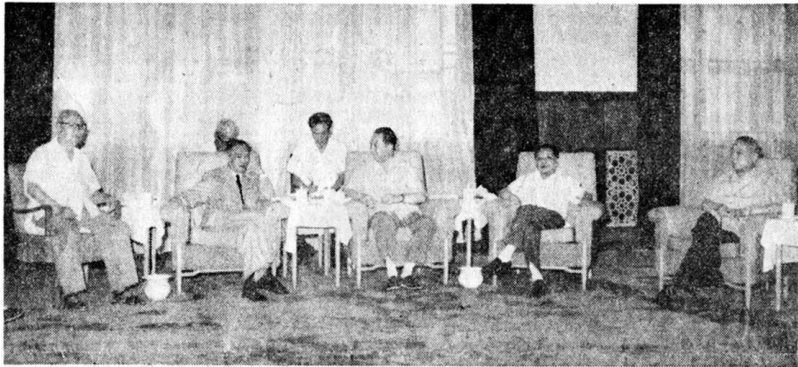
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于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们。他们对黄文欢同志这次辗转安全来到中国，表示很高兴。

黄文欢同志说：“此次到中国来，是为了表示对黎笋反华政策的抗议；同时也是要向越南人民、全世界人民宣告，越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

华国锋同志接着说：“中越两国人民具有悠久的传统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谁要破坏，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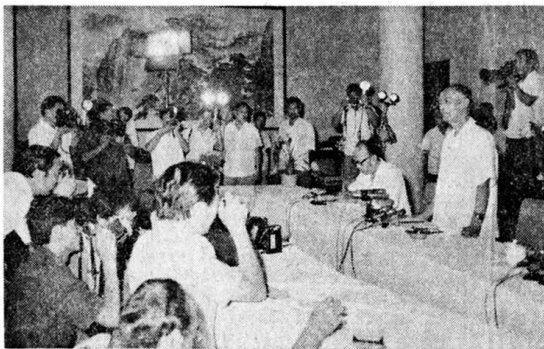
会见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同志设宴招待黄文欢同志。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耿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联部部长姬鹏飞，外交部部长黄华等。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于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们。对黄文欢同志这次辗转安全来到中国，表示很高兴。 新华社记者摄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八月九日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摄



在加速实现工业现代化建设中

### 石油部发挥各级顾问传帮带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石油部认真做好司、局级单位顾问的工作，使担任顾问职务的老干部在加速实现石油工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个部的一些经历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干部，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一定的企业管理水平。石油部党组认为，这些老干部是党和人民的财富，是石油战线一支可贵的力量。去年八月，石油部党组根据在京老干部的业务专长和身体状况，逐个做思想工作，安排了十一位同志分别担任七个司、局、院、院的顾问职务。这十一位顾问中，有七位是原司、局、院的领导干部，有四位是从事石油工作三十多年的技术干部。他们当顾问以后，有的被选为司、局党的总支或支部委员，有的当助理、局长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司、局长主动同他们商量工作，请他们出主意，传经验，搞好传、帮、带。政治部门有时请他们上党课，讲党的优良传统，讲他们自己的经验体会。对几位技术干部，除在技术上发挥他们的作用外，还请他们给青年技术干部讲课，较好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被称为“实干家”的原部机关财务司司长王凤来同志，担任财务司顾问后，保持和发扬了实干的优良作风。去年八月，王凤来同志主动要求到任丘油田整顿财务工作。在任丘油田，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帮助建立财务管理制度。油田边缘有些井队，供应仓库交通不便，他让人牵着步行到这些单位，了解财务管理工作情况，帮助进行整顿。王凤来同志还积极协助司、局长发动全司同志讨论拟订了石油工业财务条例。

从起草到定稿，他逐条逐段地推敲，逐字逐句地修改，花费了很大精力。

石油部规划设计院顾问张仁，是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脑部做过两次手术，手脚都不大灵便。担任顾问后，他工作热情很高。最近，院里筹建勘察公司，张仁同志三次到河北省石家庄市、涿县、沧州等地搞基地规划设计。同志们称他是“不在其位，能谋其政”的好顾问。

办公厅顾问甘宁同志，去年十二月参加部机关右派复查工作。他认真查阅档案材料，亲自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整理复查材料，找人谈话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了解决好错划右派改正后的安置问题，他克服身患多种疾病等困难，先后七次到山西、天津、河北等地。

石油成套技术引进公司的邹明等四位技术顾问，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都受过冲击。他们担任顾问职务以后，识大体，顾大局，讲团结，向前看，对青年技术干部认真搞好传、帮、带。

石油部党组对顾问的任用，采取三种形式：一种是分散使用，对原来做党政领导或生产管理工作的同志，分别安排他们担任各业务司、局的顾问；二是组成顾问小组，对一直从事技术工作的总工程师、总地质师集中起来，成立顾问室，让他们当参谋，把技术关，从事一些技术、科研工作；三是组织起来，集中力量解决当前一些重要问题，如参加落实干部政策、改正错划右派等工作。

石油部各级领导对顾问同志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适当给予照顾，使顾问同志感到了党的温暖和关怀。

## 黄文欢副主席致越南同胞的一封信

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八月九日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致越南同胞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

最近这些天，对我到国外一事，黎笋一伙指使一些人大事喧嚷，使全世界议论纷纷。同胞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也很关心。因此，我有几句话向大家报告如下：

经过三十多年艰苦奋斗，一九七五年，我国人民取得祖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人民渴望过安定的生活，建设祖国，打开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但是，这些革命成果和很有希望的局面，被黎笋一伙破坏得一千二净，人民的愿望成为泡影。他们使我国人民再次沦为奴隶，过着前所未有的极端困难的生活，过着前所未有的毫无民主自由的屈辱窒息的生活。他们自封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

他们颠倒黑白，以友为敌，在西南边境制造事端，侵占柬埔寨；在北方边境制造事端，动员成千上万人，进行反华战争准备；派遣成万军队去镇压老挝人民，控制整个老挝。众所周知：柬埔寨、中国和老挝都是曾经在抗法、抗美救国斗争中，和我国人民一起流血牺牲，并肩战斗的邻邦。实际上，今天的越南，在黎笋一伙控制下，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附属于外国，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都是这样。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不远的将来，越南将变成外国的一个原料供应地、加工厂和外国的军事基地。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不能沉默无言。我要革命，要千方百计摆脱他们的控制，继续革命。我从二十年代以来，跟随胡伯伯为民族独立而战斗。我热爱祖国和人民。但黎笋一伙独断专行，迫害革命者，使我无法在国内为人民工作。我不得不怀着极其悲愤和惜别的心情，离开自己的祖国。尽管我年老体弱，但只要一息尚存，我还要为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革命事业，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知道，我走后，黎笋一伙将加给我这样那样的罪名，甚至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只要我的行动有利于祖国和人民，我就无所畏惧。

我还有许多话要对同胞们讲，但因为健康关系，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趁此机会，谨向全国同胞和海外同胞亲切问候，并致以最亲爱的敬礼！

黄文欢

一九七九年八月九日

## 黄文欢副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答复问题时强调 越中战斗友谊不可动摇

由于黎笋一伙的错误，中越关系明显地恶化了。黎笋的错误政策，越南人民是不能同意的

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复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强调越中两国之间的战斗友谊的重大意义，并且指出，是黎笋一伙破坏了越中友谊。

黄文欢说：“毛主席和胡主席培育的越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友谊。它是极其美好的、极其深厚的。这种友谊是经过了几十年反对共同敌人的艰苦斗争的考验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大后方，没有中国援助的情深义重的、极其巨大的援助，越南人民在以前的抗击法帝国主义和以后的抗击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就难以取得胜利。这是越南人民都知道的。全世界人民也了解得很清楚。”

“这次我离开越南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向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表明：越南和中国之间的战斗友谊是不可动摇的。从我个人来说，我愿尽毕生之力，维护、巩固和发展越中友谊。”

他说：“自从胡志明主席逝世以后，由于黎笋一伙的错误，中越关系一天天恶化了，而且明显地恶化了。”

黄文欢在答复关于越南人民如何反抗黎笋一伙的一些问题时指出，黎笋的错误政策，越南人民是不能同意的。现在的越南没有一点点自由，任何人不能公开讲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压迫，就会有反抗。

反对黎笋的人是很多的，但这个斗争的发展，要有一个过程。

有记者问，为什么他在越南党的上次代表大会上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黄文欢说：“黎笋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有很大的错误。自从胡主席逝世以后，我曾多次针锋相对地向黎笋进行斗争，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都是这样。因此，黎笋一伙不让我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很容易理解的。”

关于越南当局把难民赶出越南的问题，黄文欢说：“这个问题，各国的广播电台和报纸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必多说。我想讲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河内把人赶到海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留在越南的华人和华裔越南人的问题。在越南的华人有一百万人以上，被赶到海上的只是一部分，有几万人。现在还留在越南的华人是最受虐待的，是苦难最深重的。他们被从世代世代居住的地方赶出去，所有的财产、房屋、用具都被抢光了。他们被赶到‘新经济区’去垦荒，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们到那里怎么能够生活呢？他们在那里由于疾病、痛苦、困难而逐渐等地死去。现在很多人、很多国家谈到了难民问题，但是很少人知道在越南国内的华人问题，所以我要谈一下这个问题。”

有记者问黄文欢今后的打算。他回答说：“现在我身体不好，还要治病，等到我的病治好以后，我将有一定的活动。”

压缩滞销的“一贯制”老产品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

### 天津染料厂革新设备发展新产品

新华社天津八月八日电 天津染料厂按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广开增产门路，改变了产品滞销、任务不足的被动局面。

天津染料厂原来大量生产的硫化青、还原蓝和增白剂，都是十年、二十年“一贯制”的老产品。过去，他们生产多少，商业部门就包销多少。不考虑产品的出路问题。今年年初，由于他们的产品在商业部门大量积压，主管部门要求他们大幅度压缩这些产品的生产，削减后的产值只相当于去年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二，厂里不少设备因而闲置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天津染料厂的职工决心变压力为动力，主动另辟门路。厂领导派出人员走访工厂、商店和外贸部门，调查了解国内外市场目前对各种染料的需求情况。他们发现，当前大量需要的是用于化纤花布等纺织品的高档活性染料和分散染料。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随时主持召开了有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一系列座谈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制定出技术改造规划，然后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贯彻执行。全厂上下齐心协力，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

一是扩大市场上适销而本厂生产量小的产品的

生产能力。他们首先对生产外贸急需的分散蓝染料的生产设备进行改造，扩大了后处理的能力；接着又在活性染料工段增添、改革了设备，使分散蓝染料的生产能力提高了百分之三十；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二是改造生产滞销老产品的旧设备，增产高档染料。他们把原来生产硫化青染料的老厂房进行改建，增添必要的设备，把

这个车间变成了一个生产年产二万吨到三万吨高档染料的新车间；

三是革新专用设备，实现一机多用。这个厂生产还原蓝染料的车间设备能力大，今年的生产任务小，他们就把它这套设备改造成为既能生产还原蓝染料，又能生产活性、分散染料的多用途设备。

天津染料厂经过这样一番革新、改造，今年一至六月份，全面超额完成了八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向国家上缴的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三倍四倍。

### 山西神原高压线路建成送电

新华社太原八月五日电 山西省从神头到原平一条长八十公里的二十二万伏高压输电线路最近建成送电，从此结束了山西省南北两个电网历来分割的局面。

山西省以雁门关为界，北边的雁门电网电力有余，而担负太原、阳泉、长治三个工业城市和晋中、临汾、运城、晋东南、忻县地区和吕梁部分山区用电任务的太原电网电力严重不足。横跨雁

门关的神原

高压输电线路

建成送电以后，把这两个电网联结起来，使塞上高

原神头、大同电厂的强大电流直接送到

晋南平原和上党盆地，每年可以向太原

以南地区多供电四亿多度。

神原输电线路是山西省电力工业部

门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继霍（县）长

（治）线、霍（县）运（城）线建成送

电之后的第三条二十二万伏的高压输电



张志新同志在向地宣布死刑判决书的时候,严峻地回答:“我的观点不变”。现在,对于她始终坚持并且因之最后被处死的那些思想政治观点,我们知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打破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砸烂了他们的精神枷锁以后,我国理论界和广大干部、群众所提出、所议论的那些问题和观点。例如,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执行的极左路线问题,关于不能把领袖神化的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问题,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关于历史的是非功过问题,等等。张志新同志比我们整整早十年时间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完全依靠自己的独立探索 and 判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科学的、明确的回答。当她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党的一贯教导,依据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事实,认定她所坚持的这些观点是真理以后,就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为捍卫这些真理而斗争。她认为,坚持这些真理,就是坚持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所以她宁死不屈,坚定地回答:“我的观点不变”。

张志新同志为我国理论工作、为我们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面光辉的镜子。它能照出我们队伍中那些不光彩的东西,照出我们身上那些应当清除的灰尘。

张志新同志在大学学过马列主义,也在党校做过教学工作,但她主要不是做理论工作的。可是,在她身上,却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也是我们理论界里许多人在往很缺乏的品质,即不同一切迷信、偏见相妥协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真理的忠诚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的一致性。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理论水平可以有高低,认识可能有错误,但必须具备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的品格,即严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相妥协的精神。可惜在我们的理论队伍里,却并不是能够这样的。

当然,有一些同志,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善于从实际出发,不管在什么样的形势和潮流下,都能够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独立的、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这些同志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代言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另外有些人,名义上也是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上离马克思主义有十万八千里。他们中有人并不缺乏研究理论的聪明,有时也能写出一些洋洋洒洒、头头是道的大块文章来。可惜他们的聪明没有用在探讨真理上,而是用来别处去了。他们到处试探风潮,揣摩气候,打听行情;朝三暮四,一心思想过提出某种主张或反对某种观点来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甚至以此作为谋求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阶梯。在这种人看来,理论观点同自由市场的商品是一样的,是早晚有人价不同的。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撤去了客观是非的界限、真理和谬误的界限。他们在地位不高的时候,象投机倒卖的小商贩,时机一到,就变成了押宝赌博的

# 理论工作者的一面镜子

卢之超

野心家。前些年,我国文坛、艺坛上出现的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不就是这样的典型吗?

我们从事理论工作的多数同志,是真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也愿意用自己的工作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但是在复杂的形势下,往往不能象张志新同志那样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更缺乏张志新同志那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正是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对照烈士找差距,多多地向张志新同志学习。

张志新同志那种明辨是非的能力,来自她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的态度,来自她根据马克思主义进行独立思考的艰苦努力。真正的理论工作,应当是严格地依据事实,深入事物的本质,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张志新同志就是这样做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在这不多的战斗年代中,再不能作懒汉和糊涂虫,行动要自理,思考要独立,以严肃认真战斗的科学态度,在斗争实践中去掌握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因而她得出的是科学的、是非分明的、而且具有高度自信的结论。但是我们许多同志却往往缺乏这种不受任何权威、偏见、迷信的束缚进行独立思考的精神。有些问题,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并不难判断其是非。但是在特定的形势和条件下,往往就糊涂起来,甚至以为是非,以非为是。这里所说的特定形势和条件,就是人们经常遇到的由各种认识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具有普遍性的迷信或偏见。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唯物主义者哲学家培根,为了打破长期中世纪宗教统治下形成的种种偏见,曾经仔细分析过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种种原因(所谓“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在思想上起过巨大的革命作用。今天无论是社会状况和人们认识真理的状况都与那个时代大不同了,但不能认为产生各种偏见的认识原因和社会原因就不存在了。事实上,经常有一些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框框束缚我们的头脑;而如果没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的艰苦的独立思考的过程,这些框框是很难打破的。就拿张志新同志当时所明确提出的那些问题来说,其中许多问题同志们不是没有考虑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从理论上辨别其错误的的能力,但为什么就不能象张志新同志那样作出明确的判断呢?归根到底,无非是因为林彪、“四人帮”鼓吹邪说起来,制造了种种精神枷锁,形成了一种似乎具有压倒一切之势的舆论压力。而我们自己虽发现一些问题,但不敢想下去,不能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盲从代替了思考,丧失了独立判断问题的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与张志新同志之间的差距。

刻苦追求真理的态度与大大无畏地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张志新同志更加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她对党的事业、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高度责任心,自觉地承担起坚持真理的神圣责任,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她有一段出自肺腑的充满凛然正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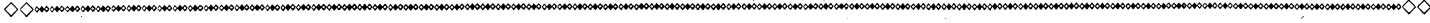
自白:“在我学习的年代里,或工作的岁月中,不是别人,正是广大的贫下中农阶级劳苦,终年勤劳劳动使得我们终日饱餐,给我们的学习、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在路线斗争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若少闻未见也可不加责难,一旦发觉仍处之泰然,贪图个人安逸,不究不管,那么有朝一日被阶级弟兄质问:供你们念这么多书,享有这么优越条件,为什么没发现问题,见到了又置之不理,好象与己无关。你们是谁的干部,是什么党员,难道你们会吃饭?!”那时候她做出什么回答?”这段话,道出了她坚持真理的勇气与力量的源泉。我们许多理论工作者虽然在享受人民提供的学习和工作的条件上与张志新同志有大体相同的经历,甚至比她优越,但却缺乏她这种可贵的阶级感情,缺乏这种理论工作者应有的党性修养,没有把坚持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因此,在阿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上,常常表现出严重的自由主义。有些问题视而不见,不求深解;有些问题明知不对,也处之泰然;有些问题能辨别出是非对错,但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正确的不敢坚持,错误的不敢反对。我们的一些同志,无论是研究问题,还是说话、写文章,总想把自己拴在一根经验带上,或者照抄照搬经典著作家的结论,或者到处打听“上面的精神”,谁的官大就听谁的;或者眼睛盯着权威,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每当形势有些变化,或一些理论问题没有定论,要我们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时,不是“心有余悸”就是“心有预悸”,悸个没完。结果,把自己从一个理论工作者降为留声机、传声筒或文字匠。我们也常说,理论工作是一种革命工作,却很少想到,要革命就得准备承担痛苦和牺牲;我们 also 常说,理论工作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却不敢在需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仗义执言时挺身而出。比之张志新同志,这使我们深感惭愧。

这里想多谈几句关于理论工作要毫无顾忌、无所畏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是宣传真理、探讨真理的工作。真理就其内容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能不能掌握真理、敢不敢坚持真理的问题上,却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或应当是。所以,坚持真理就是坚持革命,只有坚持革命才能坚持真理。要真诚地说出事实,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就要同那些不敢承认事实、不愿见到真理的邪恶势力作斗争,还要同那些误认真理为错误、错误为真理的人作斗争,并且准备受到压制和打击。鲁迅先生常常嘲笑那些只想躺在沙发上喝咖啡的“革命作家”,不愿就因为他们空喊革命而不愿为此做出任何牺牲,不愿吃一点革命者难免要吃的苦头。在反动阶级统治的旧社会,事情固然是这样:事实已经证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事情也难以完全避免。

且不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那种特殊情况,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正确的东西得不到人们的承认,真理被当作谬误,香花被看成毒草,因坚持真理而受到不应有的压制、打击和处罚,仍然是常有的事。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象在,在理论工作的道路上已没有荆棘而全是玫瑰花。

在这个意义上,同样用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当然,这一切是从理论工作者个人应有的觉悟来说的。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需要为理论界开展自由而切实的研究和探讨创造良好的环境和空气。以前,往往是领导人出面、出观点,只要求理论工作者去解释和说明,而较少鼓励他们从实践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甚至使那些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就某些问题提出自己见解的理论工作者受到批判和打击。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需要的只是“梁效”一类的吹鼓手,任何革命的理论探讨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这些历史情况说明,许多人“余悸”、“预悸”甚多,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需要总结长期以来理论工作方面的教训,特别是记取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粉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精神枷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贯彻到理论研究工作中去。在人民内部,应当允许舆论不一律,允许有各种理论观点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用正确的观点去克服错误的观点,由先进的人们去说服落后的人们,发展我们的理论。对于理论上的的是非对错,只能通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并最后通过实践的检验去判断。毫无疑问,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坚决服从和执行党的决议,自觉地使自己的工作服务于党的事业;作为一个公民,也应当坚决服从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法规。但是,对于理论问题,如同一切科学问题一样,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应当明确规定,在理论问题上,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党员、普通群众,都是平等的,相互间都可以自由地讨论和辩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无产阶级当然也会有也会有自己的理论权威,但这种权威必须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是以为自己理论上的深刻和正确赢得的,是大家自觉自愿地信任的,而绝不能靠地位和权力去树立。权威和非权威,在理论上也是应当是平等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威,在理论上从来就是以平等身份同别人进行争论、辩论、批评和反批评的。总之,必须实行民主制,绝不能以压服人,绝不能对不同观点采取压制的办法,或者采取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理论界造成一种为人民的利益、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而毫无顾忌地进行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和浓厚空气。

愿我们的理论界能出现千千万万个不惜牺牲一切为真理而斗争的张志新,愿我们今后没有一个人再受到类似张志新所受的那样的遭遇。



## “国情”论小考

叶林生 王致中

对于发扬民主,有些人总是摇头。他们说:“中国的国情不适于讲民主。”中国人不懂得民主”还说:“中国历来就不曾搞过民主选举”,“人多口杂,一讲民主,天下大乱,历来如此。”听起来,他们很重视这个“历来”的“国情”,似乎还作了点历史考证。

对此,我们也颇有兴趣于。就是,一边读近代中国的一些史料,一边就对这个“历来”做了点调查。中国“国情”如何,姑且不论:“国情”论的所谓可真不算错了。享受着有条不紊的“专制之“福”的中国人民,受“国情”论的训导也很有些年头了。

近代开闢,大凡新一点的东西,总是要到所谓“不符合中国国情”之类的非议。象平常不过的铁路,开头就曾被认为不合“用夷变夏”的“不合国情”的怪物,被顽固们反对了一气。只是洋枪炮地外,尽管新,却被认为“适合中国国情”而接受。那大抵是因为当时反对的中国百姓,用的是刀、矛、剑、戟,拿火药武器对付他们自然很合“国情”。“至于“民主”、“共和”一类的新玩意,则属“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之类,近代以来一直就被认为“不合国情”而屡遭排斥、镇压,毫无通融之余地。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学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制度,对“皇权”实在并无“打倒”之意,只不过是想用“民权”对君权稍作限制。对此,张之洞、叶德辉之流视若仇仇,大谈“中国”,咒骂什么“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君权既下,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奉天下而乱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638页)张之洞还写了《劝学篇》,认为按中国“国情”,“民权”和“叛逆”之罪差不多,“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将乱,大乱四起”。简直危言耸听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情”只能是“君主之国”,没有君权,就国将不国;人民有了权,天地就要倒转。因此,什么“民权”、“民主”,统统成了“惑世”、“乱民”的罪端邪说。

其后,辛亥革命推翻了那种“天经地义”的君主之国,为张、叶辈的“国情”论作了结论。但还有人不肯罢休。臭名昭著的梁安会就是以讨论“国体”,顺应“民心”,适合

“国情”为名,为袁皇帝登位效劳的。梁安会六君子之一、同盟会叛徒刘师培,在袁世凯授意之下,还专门写了一篇《国情论》。他们认为,按中国“国情”,要拨乱求治,必须去民主而行专制。梁安会二次宣旨就说:“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但当时的中国,民主共和国华竟也是一种现实,于是,他们居然搜罗起一批人,“举直选举”,既照顾了“民主”的面子,又“选”出了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实在可算是最合“国情”了。

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匆匆删亡。这又一次宣告了“国情”论的命运。但是,在“国情”名义下的好戏远远没有唱完。紧接着,就有张勋、康有为拥戴清废帝复辟的丑剧上演,那依据,也无非是清帝复位最合“国情”。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曾经被叶德辉称为必欲“手刃其人为天下离经叛道者戒”的“逆贼”康有为,竟然也唱起“国情”论的老调,而且更顽固。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依然不肯认输,写了篇《共和平议》,摆了些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由。他摆:“吾国人民,无民主共和之念;全国士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而妄行失败”,“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中国广大民众”,“尤非专制不能定乱”,“非专制不能为治”,“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不忍》杂志第九、十合刊)然而,他毕竟不是戊戌年间的康南海了。他洋洋洒洒的皇皇大文,除陈独秀痛斥一顿外,已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五四运动之后,马列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传播,又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那些豪绅、士大夫、社会流言、独裁者,从胡适之到蒋介石,又一次求助于“国情”论。他们说,马列主义是外国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是“舶来品”,宣传它就是“匪”,就是“阿狗阿猫”,就是“鹦鹉学舌”,就是“卖国”,甚至要斩尽杀绝。但马列主义还是胜利了。中国“国情”如何,历史自有定论。

对“国情”论的这段历史作一点考证,似乎可以使人们得到一点教益。

其一,“国情”论鼓吹最烈、闹得最凶的时候,恰恰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时候。

其二,“国情”论鼓吹者通常是有权有势者。

其三,“国情”论鼓吹者喜欢抓住“乱”字大作文章。仔细一考察,原来他们怕的“乱”,同广大中国

人民怕的乱全然不是一回事。

中国人民是真正懂得什么叫乱的。就在“国情”论者怕“乱”、喊“乱”、治“乱”、戡“乱”的过程中,专制制度覆灭了,马列主义传播了,无产阶级胜利了。

要说“国情”论一点根据没有,那也不是事实。“国情”论几度泛滥,几回兴起,足见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那就是封建主义长期留下的顽症。应该指出的是,上面所讲的“国情”论,同人们通常讲的“办事要符合中国实际”,恰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些鼓吹“国情”论最烈的,他们讲“国情”,无非是抱残守缺,卫专制,保权势而已。因此,所谓“国情”者,实为“官情”、“私情”、“权势之私”,又何曾想到“国”?其实,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中国人民深受专制主义的苦痛,才是真正的“国情”。由此造成的国家落后、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等灾难才是真正的“国情”。三千年前就是如此,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近代新旧民主革命中,高唱“国情”论的虽不乏其人,而奋起抗争的人也实在不少,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那正是“国情”论甚嚣尘上之时,针对中国人民“无政事之智慧”、“若奉行共和,断无善果”的谬论,李大钊写了《国家》一文,其中说:“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中国相接矣!谓禁万禁以阙之,民亦将违禁政权而不顾,乃纵其习惯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国情”论者“必欲借以往之旧制,必欲使吾民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吾不识制宪法德国籍者,将以求治乎,抑以藩乱乎?”(《李大钊选集》第5—6页)这句话实在中肯。当然,当时的“国情”论者是不会听得进去的,但历史的进程证明了李大钊是正确的。那证据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了。

不过,中国人民无疑不会满足于仅仅“站立”,他们要沿着四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这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还有人要再摆弄历史上早已老掉牙的“国情”论,那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的后代还会有机会考证的吧。

## 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

艾征

记得有一位老一辈的理论工作者在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曾说:我不需要什么“三不主义”,帽子和棍子太多了,也不在乎,我只要求答释权,允许我反批评。当然,他的话,是极而言之。党的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三不主义”方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办法。我这里引用的这段话,是想说,我们的许多老一辈理论家,是很有理论勇气的,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他们当中的许多同志,由于坚持自己的见解,曾遭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们从未屈从于专制主义的淫威。

现在,就总的情况来说,“三不主义”方针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也要看到,现实生活是复杂的,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何况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在某些单位、某些场合,总还会有少数人,在有一小点风波时,会习惯地拿起“棍子”打人。这是难以绝迹的。如果认为,一定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人干这种事了,才敢于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那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也是不现实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5页)从事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工作者,为了坚持真理,也必须根绝一切犹豫和怯懦,具有敢于“下地狱”的胆识和勇气。也只有具备了这种胆识和勇气,才能闯过进入宝库富有的社会科学“的入口”,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建树。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被认为是毒草,遭到种种打击,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就不能创立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列宁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and 实践。毛泽东同志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就不会有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胜利。

在当前,思想理论工作肩负着引导和鼓舞全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光荣任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革命导师并没有给我们预下现成的答案,而是有待我们去研究。我们不仅要敢于冲破那些旧有的禁区,而且要敢于去探索前人所未有探索过的新问题。面临着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应该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就是说,要不怕来刀除万难,不怕别人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这是一个思想理论工作者有觉悟的表现,是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

听说,前些时候,理论界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由于看到当时个别人大有振“牛鬼蛇神”之势,后悔起来,说:“以前说多了,今后决不多说了。”这当然是极个别的,但却是很不应该的。郑板桥在《竹石》诗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我们既然“咬定”了四化这座“青山”,就不应该遇到一点冷风,心灰意懒,而应该象根深叶茂的竹子那样,任你千磨万击,甚至哪怕挨它几棍子,仍然是无所畏惧,坚劲挺立,生生不已。

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四个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原载《云南日报》,本报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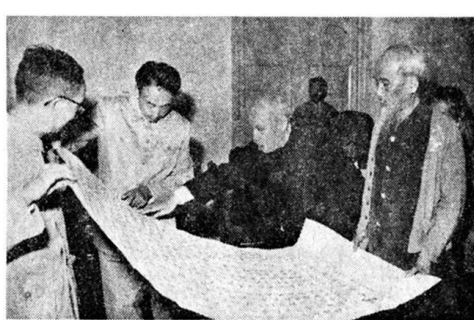
中越情谊深



◇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同志和胡志明、黄文欢同志在北京机场上。

◇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胡志明主席。

◇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胡志明主席在黄山观看董必武副主席赠给他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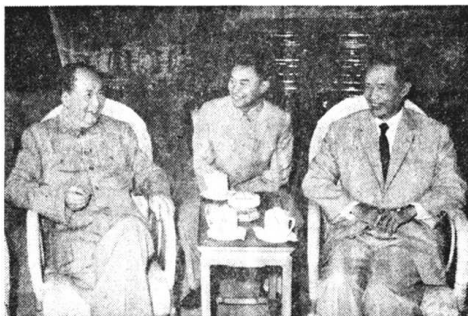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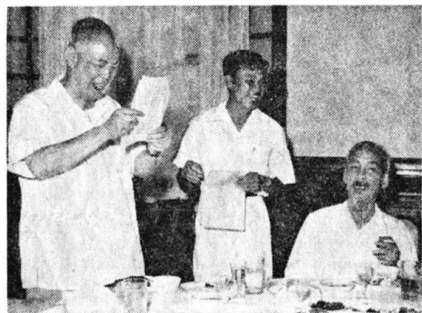


◇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总理同胡志明主席在一起。

◇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六日，毛主席会见黄文欢同志。

◇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宋庆龄副主席在家会见并设宴招待胡志明主席。

◇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同黄文欢同志在一起。



◇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一日，叶剑英同志作诗赠给胡志明主席。

◇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二日，朱德同志会见黄文欢同志。（本版照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摄）

◇ 一九六五年六月三日，胡志明主席同安徽黄山幼儿园的小朋友在一起。



第四届全运会十八个项目的预赛全部结束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第四届全运会十八个项目的预赛，到八月五日已全部结束。

这届全运会共有三十四个比赛项目，其中有十八个项目先期进行预赛。这些项目是：足球（成年和少年）、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

女子垒球、田径（成年）、体操、技巧、棋类、击剑、花样滑冰、冰球、射击、摩托车、航海模型。

这届全运会的预赛工作是从今春开始陆续进行的，参加预选赛的运动员有七千五百多人，被选拔参加决赛和直接参加决赛的运动员共七千九百多人。

“新体育杯”围棋邀请赛结束

聂卫平 陈祖德 分获冠亚军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九日电 “新体育杯”围棋邀请赛于八月四日结束，黑龙江选手聂卫平获得冠军，上海的陈祖德获得亚军。

这次“新体育杯”围棋邀请赛是由《新体育》杂志社举办的。比赛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参加比赛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围棋能手，北京市各区的一些围棋选手，以及首都新闻单位的围棋爱好者。

获得这次比赛第三名的是北京青年选手常振明，安徽选手王汝南获得第四名。

无人操作的海洋水文气象站开始观测

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一个无人操作的海洋水文气象站，最近正在长江口北部、黄海南部海区日夜监测着大海的温度、气压和海上的风力、风向等变化情况。

这个自动化的海洋水文气象站，是我国第一个观天测海的大型海洋水文遥测浮标站。它由船室、桅杆、平台三个部分组成，就象一只停泊在海上的圆型小海船，由三根锚链固定在海上。它可以在恶劣的海洋环境条件下，获得调查船只难于测得的海洋水文气象资料。

今年七月初，国家海洋局把这个浮标站放到黄海南部、长江口北部海区。近一个月来，这个站每天按预定的程序，把测到的多种水文气象要素发回岸上接受站。这个无人海洋水文气象站的应用，为我国海洋预报、海洋调查和科研工作增加了新的手段。

这个浮标站是一九七八年六月由青岛仪器仪表研究所研制成功的。经过海上试验，性能良好。去年十二月，又经第一机械工业部、国家海洋局等有关部门鉴定，认为达到了设计标准。

天津市文艺舞台活跃

据新华社天津八月八日电 最近在天津市文艺舞台上出现的话剧《婚礼》，京剧《青山》、《清明雨》和评剧《她又回来了》等反映现实题材的剧目，受到观众的热情欢迎。人们说，这样一批戏剧连台演出，是天津文艺战线多年来少有的气象。

天津市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婚礼》，是这批剧目中突出的一个。剧中讲的是某化肥厂的老工人盛永昌一家三个女儿婚姻上悲欢离合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创伤，歌颂革命青年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的高尚品格。剧本的执笔者航海是一位青年作者，她和她的同志们曾长期深入工厂、工地、油田体验生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素材。最近，话剧《婚礼》已被改编为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中。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

新华社北京八月七日电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最近成立，并开始与国外电影公司合作拍片的业务。

公司负责人赵伟对本报记者说，随着国际文化交流工作的广泛开展，国外要求来我国合作拍摄电影的日益增多。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就是适应这一新形势而成立的。合作形式包括联合摄制，提供劳务、技术设备等。赵伟指出，与国外合作拍摄电影，有利于增进国际间相互了解和他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是企事业单位，由经理、副经理主持工作，并设有业务处、接待处、编译处等机构。

# 看“愚公”怎样聪明起来

——沙石峪大队党支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思想解放,精神大振,步伐坚定

本报记者 东生

**编者按:**这篇文章长些,但内容丰富,值得一读。沙石峪这个以“当代愚公”闻名全国的先进单位,也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如此严重的摧残,这又一次说明,极左路线的危害之大、流毒之深,是万万不可低估的。

沙石峪大队党支部,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武器,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十几年来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弄清了什么是非,干部、群众变得更聪明起来,重新振奋起“愚公精神”,同心同德,在实现“四化”的道路上迈开新的步伐。

现在还有有些人,不去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以肃清流毒;不去搞清理的标准问题,以解放思想,以致十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到底是什么,仍然说不清道不明,往前走也就迈不开步,或者走得摇摇摆晃。希望这些同志从沙石峪的经验中得到启发,认真想一想自己那里的问题,也变得聪明起来。

二是当干部的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样才能少犯错误;三是作为共产党员,有了错不能图个人面子,要为人民的利益坚决改。”

分析这件事,党支部得出一个结论:对别人的经验不能迷信,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它好不好。不好的,当然不能学;好的,也不能生搬硬套,而要因地制宜,结合自己的实际有所创造,这样才能从学先进发展为超过先进。

学先进不易,超先进更难,不仅难在自己有没有雄心壮志,而且还难在别人让不让你超。这里,关键还是要抱着科学的老态度。有这样一件令人难忘的事。一九七六年,社员年终分红时,前县委书记打电话问张贵顺:“你们今年分多少?”张贵顺说:“平均每人分一百四十三元。”“谁让你们分这么多?”“我们自己定的。”“那不行!不能超过一百二十元。”“已经分了,咋办?”“那也不行!”县里派人来,硬要从社员手里退回二百三十元。党支部开会讨论咋办,大伙说:坚决顶住!口头答应退,但只从账面上退,实际上不退。那位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说穿了,主要是他不准沙石峪超过自己领导的“老先进”。这实际上也是不让沙石峪人富起来。遇到这种情况,党支部认为,不准超也不好,不让富也要富!超先进是大好事,富起来是人心所向,谁也阻挡不了。在发展集体生产上,在改善社员生活上,都要超先进。没有超的劲头,怎么能你追我赶向前进呢?

沙石峪也是一个“老先进”,但比较注意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短处,学习别人的长处。张贵顺六十七岁了,还特别“爱新鲜”。一听哪出了好经验,他就想方设法要学到手。他常到邻村走门串户,交流经验,真心地欢迎兄弟大队超过沙石峪。可是,一九七七年,前县委书记把他训了一顿,说什么:“你是沙石峪的支部书记,哪想到乱扯话去!”当然,张贵顺没有听他的,心里想着周总理的话:“一朵鲜花不是春……”

搞比学赶超超,也要办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这是一把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有了它,“移山”再难也不怕!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第二次来沙石峪的时候,闹闹闹参观的一个干部“立春过了是什么节气?”这个外号叫“铁嘴钢牙”的干部信口答道:“过了立春是清明。”周总理停住脚步,目光严厉而又关切地说:“不懂二十四个节气,就不是庄稼人。以后要好好学。”当时正是“夺权”高潮,一帮人把张贵顺“打倒”了。“铁嘴钢牙”当上了“一把手”。周总理又问他:“去年果树收获多少?”他说:“不小,果子收了十一万斤。”周总理问:“谁栽的树?”他答:“群众栽的。”周总理又问:“谁带的头呀?”他不得不承认:“那是张贵顺呢。”

这年一春,张贵顺却被作为“专政对象”,由两个民兵押到东山看管起来。飞机走了,他一回到家,社员们都跑来说:“周总理又来了!还打听你哪!”老支书望着蓝天、白云,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有多少话要向周总理讲啊!可周总理走了,走了,恐怕再也见不着了……

此后几年,周总理几次讲应该让张贵顺站出来工作。三次来到沙石峪的李先念副总理也说过:“张贵顺是你们互助合作的带头人,带的很好嘛!”

张贵顺站出来了。他面临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全村人团结在一块。林彪、“四人帮”一伙,挑动社员反我、我斗你,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搅成一团乱麻。沙石峪自然也不例外。老支书如解开这团乱麻呢?干部也好,社员也好,眼睛都在望着他,特别要看他怎样对待“反”他的人。

那个“铁嘴钢牙”是张贵顺的入党介绍人,可 he 后来听说张贵顺入党是假的。正是他领着二帮人跑到县里去闹,开除了张贵顺的党籍。他说:“想不到,我还当了一把手呢!”不到一个月,他也被轰下台来了。他处理他的问题时,支委会讨论要开除他的党籍,许多党员也提出至少要叫他退党。张贵顺说:“我不同意。”

当张贵顺介绍入党的一个干部,继“铁嘴钢牙”之后,当了“一把手”,迟迟不让张贵顺站出来。他说:“张贵顺能力比我强,威望比我高,后来就显不出我来。他稍微一伸腰,就顶我们几个人!”后来,这个干部受到了批判。可他长期不肯认错。党支部两次要开除他出党,又是张贵顺

说:“我不同意。”

张贵顺为啥不同意呢?因为他痛切地感到,任何时候都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干革命总是人多地少。回想在极左路线下,农村基层干部挨了多少整啊!张贵顺决不想。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还可以党性战胜了私心。在支委会上、社员大会上,他几次三番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造‘坏山田’是我的责任。不从实际出发,‘靠山吃山’,全面发疯,那肯定是要摔跤。幸亏大伙提醒得早,党支部及时刹车。否则,沙石峪的家底就要败光。”他又说:“这件事给了我三条教训,一是领导生产不能凭个人的主观意志,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

国家花了十几万元,给盖了一个机械化养猪场,起先利用率并不高,只养了四、五百头猪。张贵顺暗暗下了决心:不能这么干!躺在外援上,人就要变懒,甚至赶不来了。再则,花这么多钱,养这么点猪,值得吗?所以,上边几次催,他都谢绝了。但他亲自抓养猪事业,大队猪场办得越好,十一个人管八百多头猪,逐步创造条件实行机械化。三年来,保持了“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共向国家交售肥猪二千零四十九头。

依靠自己,决不是不要外援。沙石峪人忘不了,工人阶级的支援,国家的帮助,是何等重要!别的不说,单讲水吧。多少个冬春,他们用钢钎、铁锤,在石头上凿出了无数个蓄水池和鱼鳞坑,但始终没有解决水的问题。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正在上级党委的关怀下,在工人老大哥的帮助下,才先后打了十六眼机井。“滴水贵如油”变成“泉水满山流”!为此,大队花了五十万元,国家无偿支援二十万元。党支部最近作出决定,从一九八〇年起,逐年把二十万元全部还给国家;就是国家不要,也要把这笔钱拿出来支援兄弟大队。对这一决定,社员们热烈拥护的掌声。

“移山”要靠自己,不能依仗别人——这不正是“愚公”的聪明之处么?实践证明,有了“愚公精神”,山再高也会越挖越小。

“你们这里不亚于大寨”,周总理在沙石峪说,张贵顺不安地表示:“大寨,那可差的远呢!”周总理指着西山一片松柏:“树就是大寨嘛!”然后又说:“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要搞比学赶超。你们要关心周围的大队,把他们也带动起来。”

在沙石峪的山坡上,有过一条引人注目的大标语:“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许多参观者佩服“愚公”有气魄,但也有个人摇头:提“超大寨”,这……合适吗?有人干脆就说:“超大寨”这个口号“反动”。沙石峪人开始没有理睬,后来不行了。全村都在传:“县里打电报来啦!”说在某月某日以前,“标语一定要去掉,不能提‘超’!”

这条标语去掉了,但她始终刻在人们心里。张贵顺说:“没有超的精神,先进就学不好,也赶不上。超,就是要有前所进,有所创造。”

围绕“比学赶超超”的问题,党支部抓住几件事,进行了“典型解剖”。

一九七五年,张贵顺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来,提出要学先进,搞人造小平原。党支部开了几次会,越开,大伙头脑越热。经过讨论,决定“炸掉两座山,改成十块地”;二十年内,把全村五十多块地合并成十块,每块一百亩,两年搞一块。群众也被鼓动起来了。寒冬腊月,全村出动;从早到晚,炮声隆隆。大干一冬一春,第一块“环山田”造好了。一百三十多块梯田连成了一条。这块长四千米、宽七米

的环山小平原,象一条彩带缠着沙石峪的山腰,煞是好看!可是,种田不是给人看的。动工之前,群众讨论时表态拥护,一实践,矛盾就出来了。最尖锐的是,为了造田,不要砍柴烧火?社员们望着十几棵大核桃树,痛心地说:“桃杏树也要了,这么大的核桃树要长二、三年呀!”张贵顺何尝不心疼呢?为了在石头上栽这些果树,他耗费了多少心血呵!一九七七年,干部、社员纷纷提出:“这样整地,非整劳了不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张贵顺也怀疑起来:这样干,到底对不对呢?党支部决定,“十块地”计划暂告。去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好似一阵春风,把老支书的心吹开了窍。他边学习,边思考,扳着指头算了几笔账:

窄山下有七、八亩地,根本用不着整。但为了好看,扩大粮田,硬把它们连成一片。上边五、六十棵桃树、柿子树、核桃树被砍光。最后也只得增加了一亩多地。这不是搞形式主义、败家是什么?

造“环山田”,得到的却是:五十亩地扩大为一百亩;造田地,打石头卖给国家,收入一万多元。为增加这五十亩地,毁了二百多棵果树;花了三个工,等于两万一千;自制炸药二十多吨,成本一万五。得失相比,确是“得不偿失”。如果把这么多工和钱用来发展林、牧、副业,又会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呢?

如按原计划造第二块“环山田”,要砍掉四百多棵果树;越往山下,果树越多,要砍掉的就是上千棵、上万棵……

这么一算账,张贵顺不寒而栗,感到群众的批评是对的:自己错了,错就错在不实事求是。

错了咋办?是赶快“转弯子”,还是“打肿脸充胖子”?这又是一个能不能实事求是的考验。“十块地”计划,写在墙上,登在报上,说出去了可怎么收回?张贵顺犹豫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还可以党性战胜了私心。在支委会上、社员大会上,他几次三番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造‘坏山田’是我的责任。不从实际出发,‘靠山吃山’,全面发疯,那肯定是要摔跤。幸亏大伙提醒得早,党支部及时刹车。否则,沙石峪的家底就要败光。”他又说:“这件事给了我三条教训,一是领导生产不能凭个人的主观意志,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

沙石峪,在河北省遵化县的山窝窝里。过去,它穷得连村名也没有,后来以“当代愚公”之乡而闻名。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总理乘着直升飞机,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参观之后,满心欢喜地说:

“你们干得好!”

“这是我们的大学校。”

“希望你们更加谦虚,做出更大成绩。”

十三年过去了。这极不寻常的十三年,交织着多少痛苦与欢乐,值得人们去思索、去探讨,从而在新的长征路上,变得更加聪明起来。最近,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从周总理两次来沙石峪的情景谈起,按照十三中全会的精神,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这些年来哪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而向前看,明确目标是什么,路该怎么走。

周总理说:“越是苦的地方,干劲越大”,“这里的条件比大寨还差”。

想当年,沙石峪是:“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一穷二白这两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九五一年,沙石峪村由共产党员张贵顺带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路。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挖山不止”,挖了十五年,面貌大改变。一九六五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十八万斤,平均亩产五百五十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三十五元。从一九五十年到一九六五年,九年共向国家交售粮食四十万斤。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向国家交售干鲜果十七万斤。这些数字并不惊人,但在沙石峪来说,确是来之不易。所以,周总理称赞沙石峪人是“活愚公”,并高兴地说:“沙石峪改造成这个样子,在中国还是少有的。”

突然间,一场急风暴雨来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推行极左路线,使沙石峪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一九七二年,粮食总产量降到十七万斤,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六十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六十六元;但非但没有向国家交售粮食,反而借粮三万斤给社员当口粮,借钱一万三千元给社员分红,差不多倒退了二十年。

为什么出现这种大倒退?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党支部带领大伙批极左路线,进行了回忆对比。

一九六五年大寨,党支部号召学习大寨精神,提出“天不下雨人下雨,愚公精神闹倒天!”干部、党员带领群众,到五里外、八里外、甚至十几里外的村子去挑水。庄稼种上早死,早死又种,有一连种了四次。社员把家里的缸抬到田间,妇女们坐在田间,象给婴儿喂奶似的,一瓢一瓢地给小苗浇水。人们八十三天扁担没离肩,共挑水六万五千担,走了四十二万,等于绕地球转了将近四圈!结果,八百亩粮田,上万棵果树都获得丰收。

一九七二年,旱灾也非常严重。但“四人帮”造成的灾害更重。极左路线象瘟疫一样,苦得班子软,人心散,革命传统遭破坏,“愚公精神”受摧残。老支书张贵顺“靠边”几年,站不出来,出去惹了。当家的副支书情绪消沉。群众好象失去了“主心骨”。靠谁呢?一靠“老天当一半家”,有的干部望着天:“今天不下,明天不下,后天还不下?”二靠“外找当一半家”。有上边来的人“坐镇指挥”,有外边来的车和人支援抗旱,干部的依赖思想重了;社员领着外人东奔西跑,忙于接待;有人说:“种地的当不了家,不种地的瞎指挥,一切都乱了套。”外来的干部,硬要把一大片玉米、谷子、白薯亩拔掉,统统种高粱。从外地运来二十万颗高粱苗,已经经播了,一米高的玉米来移栽,结果也没结苗。发人深省的是,一九六五年,沙石峪人到老峪去挑水,抗旱胜利了;一九七二年,老峪人到沙石峪来挑水,抗旱也胜利了;而有了两眼水井的沙石峪,连井跟前的地也没有保住。

两次大灾,两幅图画。人们从中看到,一九七二年的大倒退,除了天灾,更是人祸——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

这年秋后,张贵顺在心里琢磨:沙石峪要翻身,还得靠“愚公精神”。他狠抓领导班子的整风,尖锐地指出:依赖别人过日子,方向错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老传统,决不能丢!干部思想一致了,又深入发动群众。一九七三年,党支部带领群众大干,使粮食总产量一下跳到六十一万斤,比一九七二年多四十四万斤;总收入十五万元,比一九七二年多七万元;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一十三元,比一九七二年多四十二万五。全村发动了!社员们纷纷要求:“就这怎么干去!”“千万别再‘回去’呀!”党支部指出:不但不能“回去”,而且要一个劲往前走!果然,一九七四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七十万斤挂零;向国家交售粮食二十万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一十七元。

然而,上边来人警告张贵顺:“光理头生产,不突出政治,‘唯生产论’严重呀!”一盆冷水洒下来,人心凉了半截。搞生产的干部,又怕人批他是“棒子粒粮食”,消极了,敢讲话的干部,又怕“出头的棒子先烂”,灰心了。这么一折腾,一九七五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四年减少了十多万斤。秋后,党支部又进行整风。张贵顺说:“上边来人,对的要听,错的就不能听。办事要从沙石峪的实际情况出发。”一九七六年春天,党支部提出:“把七五年的损失夺回来!今年保证粮食总产量八十万斤!”大标语公开贴在地上了,除了激励自己,也是为了堵住“外来的嘴”:“你们别来施加压力了,我们也要搞生产,猛干啦!”粉粹了“四人帮”,沙石峪人脖子甩开了!“愚公精神”大放光彩,生产也节节上升。

一九七六年,粮食总产量是八十八万斤,一九七七年是九十五万斤,一九七八年是九十八万斤;三年共交售粮食五十一万斤,比前七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八万斤。回顾这段历史,党支部认识到,“愚公精神”啥时候也不能丢。要靠自己去干,不能靠别人来帮。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啊!有啥这样的教训,一旦成了先进,那就要哈哈哟,不要有啥,什么自力更生呀,艰苦奋斗呀,不必了。多少先进的单位和个人,不就是这样走上邪路、甚至毁掉了?沙石峪也遇到过这种危险,但由于支部吸取了教训,最后才绝处逢生。比如,一九七七年,上级有关部门提出要给沙石峪两

万,他拿着口袋到大队去要粮食吃。年三十晚上,全家坐在一起,炕桌上只有一碗白水煮肉。大家望着这碗肉,谁都不吃。窗外,北风阵阵,鞭炮声声;屋内,灯光昏昏,死气沉沉。老支书看着这幅情景,不禁凄然泪下。心想下了几十年革命,落得今天这样……不能,不能这么想!跟着党,出生入死过来了;靠着群众,战斗地过来了;眼前这么点风浪,还经不起吗?想起几个月前,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来时,进了把把鞋子一脱,盘腿坐在炕上。周总理问贵顺老伴,家里有几口人,一年挣多少工分,生活过得怎么样,并风趣地说:“你们俩是谁当家呀?”贵顺老伴笑着说:“在外他当家,在家我当家嘛。”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都哈哈大笑起来。周总理又问:“张贵顺成天在外边工作,帮不了你多少少,你支持他吗?”贵顺老伴说:“支持,还不能不支持!”周总理说:“要大力支持,生活上多多照顾他。”……想到周总理代表党这样亲切地关怀农村干部,一股暖流涌进了老支书的心房。他把眼泪一抹,说道:“这碗肉还是要吃!”他带头吃了一块……

谈起这段往事,张贵顺感慨地说:“干部挨整,老婆、孩子也跟着倒霉,我老伴儿被逼疯了。对待干部哪能这样呢?对同志,就是要将心比心啊!干部总会犯点错误,犯了错误要批评,但批评是为了团结。如果一犯错误就挨整,谁还想去干?谁还能当干部?要是连犯错误的同志都不能团结好,那还谈得上解放全人类吗?”张贵顺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对两个人的处理,说了两个“我不同意”。

会上会下,老支书耐心地说服大家:“他介绍我入党的时候,是咱们村的村长。在敌人面前,他是‘铁嘴钢牙’,历史上有功有劳!解放后,他表现也不错。他私心很重,要帮助他,教育他。”党内不团结了。他的党籍被保留了。后来,他又得了重病。老支书去看他时,他含着泪说:“贵顺呀,我不行了。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你……”张贵顺打断了他的话:“别这么死。当年咱们一块儿干,现在还要一块儿干,革命到底呀!”老支书到处为他求医找药,终于把他把病治好了。

对另一个人,大队小会,老支书反复地开导大家:“我介绍他入党以后,从高级社开始他就当干部,为沙石峪做了很多好事,咱们可不能忘它。文化大革命中,他犯了一些错误,是非不一定分得清。但对他要具体分析,全面来看。他一时想不通,要耐心说服。”党支部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不开除,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并让他继续担任副大队长。时间过了,他的组织生活没有恢复,党员对他还有意见。有人又主张开除他的党籍。老支书仍然坚持,要说服大家历史地看待他的错误,看到他的进步;要教育他本人深刻地认识错误。支委们做了许多工作,才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

张贵顺对干部不计较个人恩怨,注意维护和加强“一班人”的团结;对群众、尤其是对“反”过自己的社员,更有着满腔热忱,做好团结工作。人们说,沙石峪没有派性,干部和社员心齐。这并不是说,没有矛盾和斗争。可贵的是,党支部大力发扬民主,注意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使人与人的关系不断改善。

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当代愚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移山”之宝。有了这个宝,什么“山”不能推倒呢!

在党的领导下,沙石峪人民团结一心,改天换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生产发展的速度加快了,收入也在迅速增加。一九七六年,总收入为二十六万元,一九七七年升到三十七万元,一九七八年达到四十二万元。大队现有卡车两部,拖拉机八部,各种农机具一百台(件);集体储备粮三十五万斤;公共积累四十六万元。一九七七年,社员集体分配收入是一百六十五元,一九七八年是一百七十三元;每年每人分口粮五百二十斤,比一九七二年多了一百六十斤。除了留自地,每户有一、二十棵果树,最多的可收果一千多斤。去年,全村一百一十七户中,一百六十户有储蓄,存款共达六百二千七百元。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活愚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经过十几年来拨乱反正,一条由穷变富的路走出来了!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使他们进一步看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革命先辈开创的“愚公移山”的壮丽事业大有希望!在社员大会上,党支部宣布了沙石峪的长远规划,决心在一九五五年前实现三个“一百万”的目标:粮食总产量一百万斤。现在只差两万斤了,但要始终保持在一百万斤以上,还要继续努力。

干鲜果总产量一百万斤。现在还差一半,争取在一九九〇年前达到。

总收入一百万元。现在还差五十八万元。准备大力发展农、牧、副业,广开财路。

愚公不愚,移山不止。在成就面前,沙石峪人没有停步。他们记得,一九六四年春天,周总理在沙石峪,临上飞机之前还谆谆嘱咐:

“要谦虚谨慎,继续前进!”

周总理的声音啊,将永远在沙石峪的九岭十七沟回响,在沙石峪人的心中激荡,使“愚公”添智慧,给“移山”增力量!

## 大兴安岭林区空运专业队灭火效果好

本报讯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为有效地保护森林资源,从今年春天开始,利用直升飞机空运专业队及时扑灭森林火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四月八日到五月二十日先后扑灭二十一起林火,基本上做到了及时发现火情,迅速出动扑救。

过去扑灭林火,需要动员千军万马上山,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往往由于扑救不及时,小火酿成大火,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灭火办法,大兴安岭地区与民航部门共同协商

